

倾听实践呼声 完善科学体系

——《中国哲学史》教材修订座谈会综述

李 维 武

由武汉大学任主编、中山大学任副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自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来,为国内许多大学哲学系所采用,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与好评,现已累积印数近十万册,成为目前广泛使用、影响很大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之一。1987年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在中山大学举行了该教材的评议、修订座谈会。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兰州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湘潭大学等十一所高校的中国哲学史任课教师代表出席了座谈会,结合教学实践,对该书的评价和修订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讨论中,大家从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 and 提高中国哲学史教学质量的双重目的出发,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科学体系等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富有新意的探讨。

第一,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该书明确提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论述的重点范围、史料的筛选原则,似应得到进一步的科学规定。”“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简括地说,就是哲学认识的矛盾发展史。”因此,全书以环绕哲学基本问题所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为论述的重点,突出地论述中国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逻辑进程,而对哲学家的非哲学思想成果则尽量删略。代表们指出,该书净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尝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解放后所编写的一些中国哲学史教材,往往把哲学家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同他的哲学思想相提并论,不加筛选。这种做法模糊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妨碍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学科的自身建设,易给初学者留下中国哲学思想贫乏驳杂的错觉。该书通过净化研究对象,突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线索,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学生们学习该书后,都感到中国哲学确有自己的丰富内容和民族特色,与西方哲学一样为人类认识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可以说,净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既有利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又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中国哲学史的兴趣,引导他们正确看待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一些代表又指出,对于净化研究对象的问题,不可作狭隘的理解,除了认识论和辩证法之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人性问题也都是环绕哲学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哲学矛盾运动的重要内容,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论述。

第二,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客观规律和研究方法。代表们认为,该书的又一个优点和特点,就是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出发,力图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特殊规律。解放后编写的一些中国哲学史教材,大都重视哲学发展的普遍根据,指出了哲学发展的社会阶级根源和自然科学基础,但对于哲学发展的特殊根据和特殊规律却重视不够。该书没有因袭前说,明确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社会诸意识形态的分析,哲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它具有自身的特殊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由问题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变,争论的深入,到思想的总结,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该书强调运用逻辑方法揭示哲学发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认为通过研究中国哲学史上主要范畴(如“天人”、“理气”、“道器”、“心物”、“一两”、“知行”等)的提出、展开和演变,能够勾画出哲学逻辑进程的“圆圈”,把握中国哲学智慧的矛盾发展及其特质。代表们认为,研究者们可以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圆圈”作出不同的理解,但探索哲学特殊规律的方向和强调逻辑研究的方法是值得肯定的。这不仅有利于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而且有助于学生们更好地掌握中国哲学史的发展线索和基本内容。

第三,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体系。代表们认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着的科

(下转120页)

注释:

- ①④⑬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3、659、328页。
② 《六大以来》(下册),第787页。
③ 潘梓年:《抗战一年来的文化运动》,载《群众》周刊第2卷第5期,第509页。
⑤ 《中国报告文学丛书》(2)第8分册,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⑥ 罗荪:《一段文学历史的回顾》,见1985年8月24日《光明日报》。
⑦⑧⑨ 《洪深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1957年版,第142、115、142页。
⑩ 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
⑪⑫ 王瑶:《中国新文化史稿》(下册),第512页。
⑬⑭ 《抗战教育》1937年12月5日第9期。
⑮⑯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88、197页。
⑰ 《群众》周刊,第2卷,第10期,第575页。
⑱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65页。

(上接127页)

学,有其自己的体系,应概括从原始思维中的哲学萌芽到毛泽东哲学思想诞生的全部中国哲学发展,揭示这一思想历程的内在规律性。然而,在我们目前通用的各种中国哲学史教材中,都只写到“五四”以前的哲学发展,而不提“五四”以后的哲学进程。这样,妨碍了中国哲学史科学体系的严整,特别是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统一链条割断了,难以揭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丰富内容和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使初学者误认为中国近代哲学不发达。事实上,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哲学运动在中西文化汇合激荡中得到更深入发展、结出更丰硕果实的时期。一方面,中西哲学开始融会成比较成熟的近代哲学诸形态,产生了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的各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文化土壤上传播、发展、逐步中国化,诞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代表们和该书主编都认为,在修订该书时,应着重补充关于“五四”以后哲学发展的论述,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中国哲学史科学体系,使学生们较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家指出,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克服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路线对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干扰。有两个问题尤应处理好: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进行深入探讨,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二,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进行具体分析,科学地评价其贡献与局限。

代表们一致认为,这部《中国哲学史》既是优秀的科研成果,又是优秀的大学教材。希望经过修订,发扬优点,克服不足,更好地贯彻上述方法论原则,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和中国哲学史教学水平的提高作出新的贡献。